

北京话儿化韵和被动句变异的社会语言学调查

摘要: 本文用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方法来获得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样品以及被动句在口语语境中的实际呈现,使用不同的样本检验方式来考察两组数据的变异情况。从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社区交往密度、语言环境等角度对样本进行分析。将此次儿化韵的调查结果与上世纪 80 年代林焘和沈炯先生做的分析作比较,发现在央化和鼻化两大动因的推动下,北京话儿化韵的分合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但其本身依然具有明显的规律性;被动句的变异则较为简单,“被”字被动句占主流,且有强化趋势。综合来看,北京话儿化韵以及被动句的变异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 儿化韵 语音分歧 被动句 社会语言学

一、北京话儿化韵的变异

(一) 北京话儿化时的语音分歧

根据上世纪 80 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部分师生对北京话进行的三期比较系统的调查中北京话儿化韵语音分歧的情况,以及 1995 年林焘和沈炯先生使用置信度工具对此进行的深入的社会语言学分析,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儿化后的韵母有的发音人认为他们是同音关系,有的发音人则认为他们不同音,两位前辈将这种分歧按照同音的动因分为 5 种。但此次的调查中又出现了一种新情况——随着普通话在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大力推行,新闻媒体报道影响范围和深度的日益扩大与加深,社会居民活动范围的迅速扩大和频率的大幅度提高,以及随着北京的城市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外来人口越来越多的流入首都从而导致“新北京人”数量迅速增多,此次考察的数据显示北京话中有许多原本可以儿化甚至倾向于儿化的词现在变得不倾向于儿化甚至完全不认可它的儿化。鉴于这种现象出现的过于频繁,所以我们在前辈 5 种分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分类,即可儿化/不可儿化,详情如下:

①鼻音韵尾脱落导致同音(前鼻音在儿化时一定会脱落,但是有的发音人依然认为相关对比词不同音,这可能是由于其他对立项所导致的):

以 a 为韵腹的开尾韵儿化后,有的人分别与 anr (或 air), ianr, uanr (uair) 同音;有人则不变——

Eg. 刀把儿-老伴儿 娃儿-玩儿
单褂儿-糖罐儿 唱歌儿-鞋跟儿

②韵母央化导致同音: ɤ-ə:

单韵母 e 儿化后,有的人会与[r, enr, eir 同音;有的人则不变——

Eg. 汽车儿-小吃儿 表格儿-表侄儿 两个儿-宝贝儿

③韵母央化导致同音: ɛ-ə:

ie, ye 儿化后,有的人分别与 ir, yr 同音;有的人不同音——

Eg. 树叶儿-玩意儿

④韵母央化导致同音: o-ə:

uo 儿化后,有的人和 unr, uir 同音;有的人不同音——

Eg. 门锁儿-打滚儿 对过儿-书柜儿

⑤鼻音韵尾脱落，元音鼻化消失导致同音：

以-ng 为韵尾的韵母儿化后，有的人是-ng 韵尾消失，元音鼻化也消失，从而出现同音现象；但有的人元音鼻化没有消失，不同音——

Eg.凉棚儿-水盆儿 水桶儿-老五儿 信封儿-满分儿

鸡汤儿-小摊儿 药房儿-翻番儿 水瓶儿-瓜皮儿

电影儿-马尾儿 眼镜儿-脚印儿 门窗儿-遛弯儿

模样儿-小燕儿

⑥可否儿化本身也存在分歧：

与前人研究相比，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北京话有许多原本儿化的词目前倾向于不儿化；但我们没有直接剔除这些不儿化的词，而是把它作为另一个变量，放在实验中进行进一步考察儿化与否是否也与社会因素有关，又是哪些社会因素在推动这一变量的变异——

Eg.小吃、凉棚、马尾等词汇项，有相当一部分发音人认为不能儿化，只有极少数认为可以儿化；同时还存在有的发音人认为虽然可以儿化，但是现在口语里已经基本上没有人这样表达了的情况。

林焘和沈炯的后期研究发现，声母、声调都会影响受试者对儿化后是否同音的感知，这种差异通过主要元音的央化和鼻化体现出来。由于前辈已经对北京话儿化韵的变异进行过相当细致且成规模的调查；本文的调查研究遵循相同的路径，考察 20 多年后的今天，北京话儿化韵的变异是否一如既往，其发展路径是否恰如林焘等前辈们预言的那样，其背后动因又是什么？是否有变？

（二）调查情况概述

由于时间、水平和人手有限，本次选取的调查点比较单一，仅涉及北京城内一个点，海淀区阜外白堆子中国航空家属院，被调查者共有 25 位；调查人 2 位，孙小雅、孙静怡。被调查人整体文化水平较高，没有文盲，最低为初中文化水平且只有一位；平均年龄比较大，受试者多为老年人。所设计的儿化韵调查表仅供调查人使用，同样用的是对比词的调查法，考察发音人各对比词是否可以儿化，以及儿化后是否同音。由于预先并不知晓受试者的受教育程度，因此使用了电脑呈现图片、引导受试者说出含儿化的对应词汇项的方法进行调查取样（当然，即使受试者均受过科学文化教育，也不应使用读词表的方法，那会使发音不自然，降低样本可信度），每组词询问发音人是否同音，谈话过程录音，并同时在问卷上作以记录。

林焘团队在判断发音人是否同音时还渗入了调查人根据录音所做的判断，但是我们认为，同音词的判断应该依据发音人的主观判断，这种母语者不受外界干扰的音位意识应当予以充分尊重和保护；因此我们小组在处理同音词时仅依据发音人的主观判断，调查者的判断不被考虑其中。最恰当的处理办法本应是分别单独统计感知上的合并率与语音分析上的合并率，两组情况进行对比，从而得出更丰富的结论，但是由于录音质量不佳，不论使用 praat 还是 matlab 中自行编的代码程序，在进行语图观测时均很难辨认清晰，我们所需要的数据是元音的鼻化和央化，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音研究室方强、李爱军的研究，对元音鼻化程度进行量化可以通过对声学信号进行频率分析从而得到，这种方法固然比林焘先生所采取的直接用人耳识别要更为精确，但同时也耗时耗力，每处理一个数据都需要以基音周期为基本单位使用矩形窗把儿化时的鼻音与元音衔接部分（或重叠部分）切取出来做 FFT 变换，每次窗口移动 3 个周期，测得所需的参数，最后量化出元音的鼻化程度。工作量巨大因此这部分工作做了一半而未能坚持下去。但是这种处理数据的思路本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没有用儿化说出来的调查词也单独另分一组,另作统计分析。共设计了 20 组对比词,包括了上述 6 种分歧,其中有 6 组对比词属于非最小对立对,他们在声调或声母上存在不同,初步研究结果显示,非最小对立对不论相关联的社会因素为何,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故在后续的研究分析中被剔除,只保留最小对立组,剩下的一共 14 组,14 组对比词由 25 人发音,得到大约 350 个分合记录。经过统计分析,计算出每一对比组的合并百分数如下:。

对比项		同音数 量	总合并 率
1	(树)叶儿-(玩)意儿	ier-ir	18 72%
2	(刀)把儿-(老)伴儿	ar-anr	17 68%
3	(单)褂儿-(糖)罐儿	uar-uanr	14 56%
4	(模)样儿-燕儿	iangr-ianr	13 52%
5	(信)封儿-(一百/满)分儿 (水)瓶儿-(西瓜)皮儿/起皮 儿	engr-enr	12 48%
6	儿	ingr-ir	11 44%
7	(凉)棚儿-(水)盆儿	engr-enr	7 28%
8	(药)方儿-(翻)一番儿	angr-anr	7 28%
9	(对)过儿-(书)柜儿	uor-uir	7 28%
10	(电)影儿-(马)尾儿	ing-ir	6 24%
11	(鸡)汤儿-(小)摊儿	angr-anr	5 20%
12	(唱)歌儿-(鞋)跟儿	er-enr	4 27%
13	娃儿-玩儿	ar-anr	1 4%
14	(汽)车儿-(小)吃儿	er-	1 4%

(三) 分析结果

综合这 14 个对比组的合并率初步统计结果来看,合并率最高的是特定韵母央化导致同音(去声)——ε-ə,也即“1.树叶儿-玩意儿”,去声时鼻音韵尾脱落所导致的同音合并率也比较高,即“2.刀把儿-老伴儿”,达到 68%;其他类型的韵母央化所导致的同音合并率都较低;这一特点与林焘、沈炯的考察相比,本次考察的韵母央化导致同音(去声)的合并率比前人调查高出约 24%,再次印证了当该词为去声时元音有较强的央化倾向;但另一方面,“对过儿”、“书柜儿”同属去声韵母央化导致的同音,但是他们的合并率则要低得多,这可能说明声母或语境会对合并产生影响;合并率高低与声调有关:去声时的鼻音韵尾脱落导致同音的合并率比其他声调的合并率高的多;这一特点与林焘、沈炯的考察相比,都是去声的鼻音韵尾脱落导致的同音合并率比较高;但可能受到样本数据规模等因素的影响,本次考察的同音合并率比林焘版的合并率低 15%~20%;鼻音韵尾脱落,元音鼻化消失所导致的同音合并率普遍都较低;但鼻化程度依然表现出不同,总趋势是元音舌位越高鼻化越弱,也就越倾向于合并;这一特点有一例外,“模样儿”“小燕儿”这组合并率要明显高于其他,达到 52%,也不符合总体趋势,这可能表明,去声时元音有较强的鼻化消失的倾向。非最小对立对的对比词,合并率均比较低,分析和参考意义不大,如下:

1	(眼) 镜儿-脚 (印) 儿	ingr-inr	8	32%
2	(表) 格儿- (表) 侄儿 (长) / (一) 个儿- (宝) 贝 儿	er-	6	24%
3	儿	er-eir	3	12%
4	(水) 桶儿- (老) 五儿	ongr-ur	3	12%
5	(门) 窗儿- (邋) 弯儿	uangr-uanr	2	8%
6	(门) 锁儿- (打) 滚儿	uor-unr	2	8%

以上通过观察各组对比词的同音合并率，我们已经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下面需要结合多项社会因素对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做出分析。

根据此次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北京话儿化韵在性别方面依然不存在语音分歧，这从 25 位发音人简单的合并百分数便可直观的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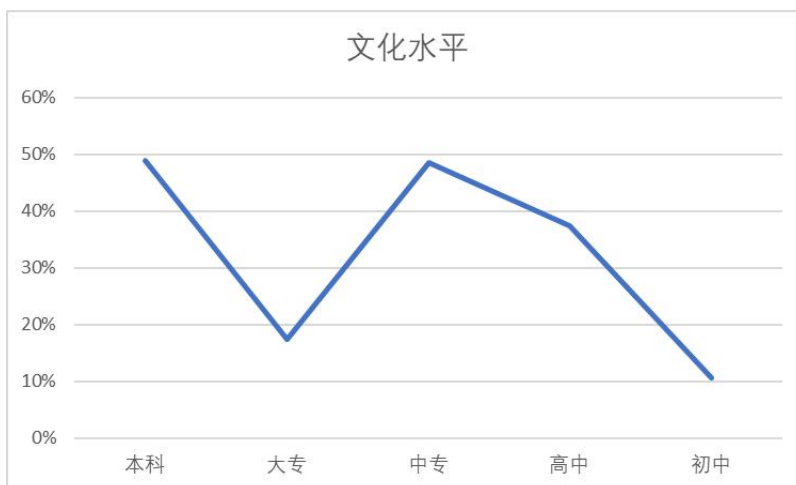
	人数	合并数	非合并数	合并率
男性	10	57	83	41%
女性	15	67	143	32%

对合并率进行直接卡方检验，得到的 P 值约为 0.09，再次证明了北京话儿化韵的同音合并率在性别上的分布并无明显差异。这与林焘先生当时的结论是相同的。

由于此次调查样本规模过小，为尽量使自己的实验数据更接近北京话儿化韵语音分歧的实际情况，我们下面的数据分析都如性别一样在百分数的基础上又使用置信度工具进一步进行检验，从而估计误差概率，以得出相对而言比较可靠的结论来。

受试者的受教育程度与北京话儿化韵的合并率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卡方检验计算得出 P 值为 4.97709E-07，为极显著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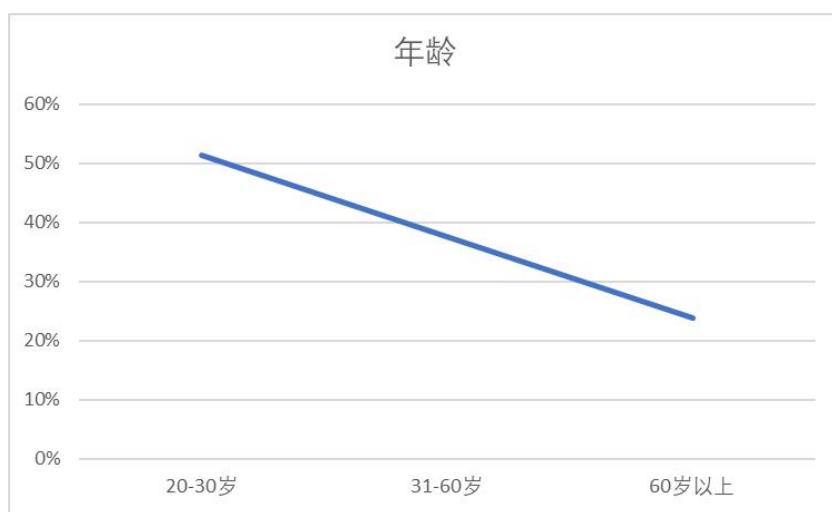
	人数	合并数	非合并数	合并率
本科	7	48	50	49%
大专	7	17	81	17%
中专	5	34	36	49%
高中	4	21	35	38%
初中	2	3	25	10.70%



由上图可见，文化水平与同音合并率大致呈正相关，文化水平越高，合并率也越高。但

是这一规律很明显并不适用于“大专”和“中专”段的合并率分布，但这一趋势却又在另一方面印证了拉波夫所提出的“曲线原则”，这一理论在这里的实际意义为：中等文化程度的受试者为追求更高文化层次的发音方式而矫枉过正，从而使得“中专”水平的同音合并率异常的高，甚至比肩“本科”文化水平的人，而这样的超越模式是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基本特征。这种现象主要涉及自上而下的对意义形式选择造成的社会压力，它清晰地体现了社会校正系统作用于个人语言形式的过程。不过“大专”文化水平的合并率确实过低，介于“高中”文化水平和“初中”文化水平之间。找寻语言变化带领者的任务已经有了初步的推测，在北京话儿化韵同音合并进程中，“中专”学历的矫枉过正可以作为进行中语音变化的共时指示特征；但是，语言变项不是和单一的某一指示项（职业、教育或收入）相联系，而是与复合的指数相联系。因此我们还需进行进一步考察和分析。

下面是考察年龄与北京话儿化韵的同音合并率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卡方检验得到 P 值约为 0.02，表明儿化合并与年龄存在相关关系：



由上折线图可知，年龄与儿化合并呈负相关关系，年龄越大，儿化合并率越低。这一通过真实时间所折射出来的显像时间规律表明，北京话儿化韵同音合并的趋势在历时变化中是不断增强的。由此可以看出青年人和文化水平中高层是合并倾向的关键。这一结论也再次佐证了林焘先生上世纪末所预测的合并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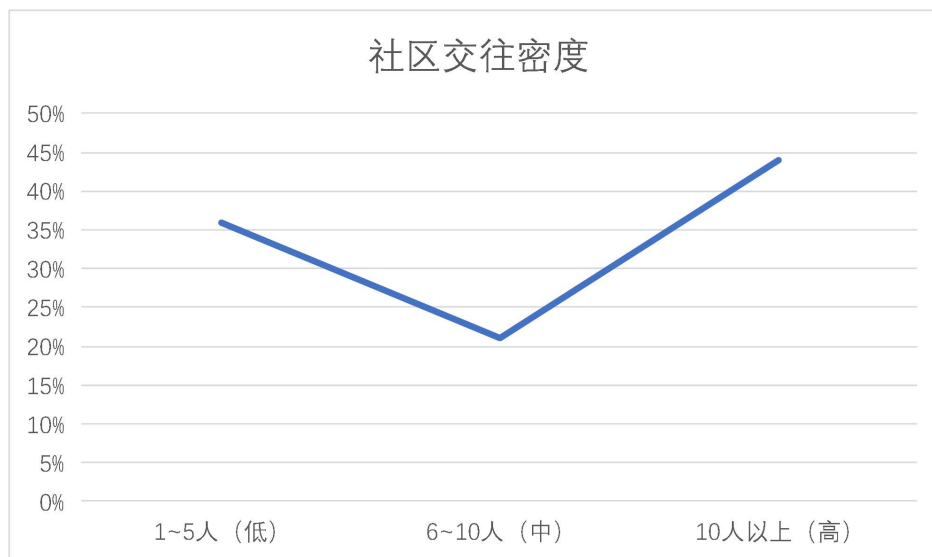
受试者的家庭语言环境也与儿化合并存在相关关系。卡方检验得到 P 值约为 0.0037，这说明北京话儿化韵的同音合并与发音人的家庭语言环境存在极显著相关关系：

	人数	合并数	非合并数	合并率
单纯北京话	21	113	181	38%
非单纯北京话	4	8	48	14%

调查结果显示，如果家庭中使用单纯的北京话或带北京话口音的普通话（由于绝大多数被试都认为普通话就是北京话，故此处使用“带北京口音的普通话”这一更为准确的说法来指称），那么儿化之后的合并率要远远比家庭生活交流中不是单纯北京话的合并率要高得多。这其中或许存在由于样本规模过小而导致的误差，但同时它至少表明，北京话和普通话对合并率的提高、合并趋势的增强是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的。与此相对，受试者父母青少年时期的语言环境和被试平时的工作语言环境均显示与儿化合并无相关关系。前者的 P 值检验约为 0.6，后者约为 0.1。出现这一结果也并不意外，这一方面是由于父母青少年时期的语言环境距离现今已过于遥远，个体语言随着社会发展也在不断变化；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个体语言变化受到语言学习关键期（一般认为是 12 岁）的影响，一般来说，在被试进入社会

获得工作时早已成年，个人语言已经基本定型，即使工作场所的语言环境并不单纯，对被试语言变化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

受试者的社区交往密度又是另一个与儿化合并密切相关的社会因素，卡方检验得到P值约为0.0059，可见社区交往密度与儿化合并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此次所调查的小区整体上属于较为松散的社会网络，这种类型的社会网络通常不易导致语言的保持。拉波夫在调查社会网络时提出了非常细致的量化指标，不过此次调查由于时间关系未能将社区内的接触密度进行量化计分，而是通过询问被试每日与社区内多少人聊天从而大致推测其交际密度。上世纪林焱先生的调查中并没有将这一因素囊括在内，此次姑且增加了这样一个分析角度，遗憾的是对此无法进行历时的对比。折线图所显示的社区交往密度与儿化合并率的关系中，基本趋势是社区交往密度越高，在儿化后的同音合并率相对也越高，他们对这种正在进行中的变化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也越大。儿化变异的带领者的又一特征是，社区交往密度较高，这一点也再次印证了拉波夫对语言变异的观点。

职业方面在统计时剔除了两组无法判断的数据（在职业栏中填的是“退休”），故只剩下23组数据。职业也与儿化合并存在相关关系。卡方检验得出的P值约0.00085，这表明职业与儿化合并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如下：

	人数	合并数	非合并数	合并率
劳动密集型	9	59	67	47%
技术密集型	14	56	140	29%

可见，从事脑力型劳动的工作者，更倾向于在儿化后趋于合并；而从事体力型劳动的工作者，这一趋势远不及脑力型劳动的工作者。这一统计结果与前面对“文化水平”这一社会因素变量的分析相吻合，文化水平越高，越容易获得技术密集型的工作，在社会上享有更高的威望，在语言体系上同样享受更高的社会威望，这一社会群体对儿化后趋于同音趋势的归顺，也将在更大范围内带动其他文化水平、职业的群体，从而助推整个儿化同音的趋向。

可儿化与不可儿化的统计与分析结果显示，这一语言变项仅与性别和家庭语言环境这两个社会因素有关，其中甚至与性别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综合来看，男性认为可以儿化的比例要比女性高10%左右，“马尾儿”、“凉棚儿”等词汇项已有不少女性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发音，即便知道也认为这样儿化的发音“太土”，因而不愿意说，根据前面的分析，如果将儿化合并认为是高雅形式，那么这一发现将再次佐证拉波夫所提出的“女性在变异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比男性更快接受高雅的变式”，因为女性对语言变式所代表的社会价值更为敏

感。

二、北京话带被动标记的被动句变异

（一）北京话口语中带被动标记的被动句变异

北京话中的被动句按照有无被动标记词的标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中在有被动标记的被动句中，不同学者对这些表被动关系的标记数目的划分也不尽相同：赵元任认为有“被、给、叫、让”四种；李珊主张有“被、叫、让、给、为、被/让……给、为/被……所”七种；黎锦熙则列出“被、为、为……所、见……于……、由、让、任、给、叫、教”十种。综合来看，学界对“被、让、叫、给”的关注最多。但是我们认为，“被/让/叫/给……给……”这种类型的表达虽然也存在，但是鉴于后者“给”已经不再作为被动标记词了，因此我们在后期处理数据时有一部分分析直接将其归入到了对应的“被、让、叫、给”当中。关于四个常见的被动标记的研究，屈哨兵指出，通用性的被动标记“被”的分析要远远比除“被”以外的有一定特色个性的被动标记在历时层面和共时层面都要走得更远。到目前为止，还鲜少有学者对这四种带被动标记的被动句在实际口语中出现的频率及其背后的动因结合社会因素进行研究，本文正基于此，以实地调查的北京话口语语料为基础，结合语言演变的内部原理，尝试着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

（二）调查情况概述

由于时间、水平和人手有限，本次选取的调查点比较单一，仅涉及北京城内一个点，海淀区阜外白堆子中国航空家属院，被调查者共有 25 位；调查人 2 位，均受过方言调查训练，李斌、段嘉懿。被调查人整体文化水平较高，没有文盲，最低为初中文化水平且只有一位；平均年龄比较大，受试者多为老年人。所设计的调查问卷仅供调查人使用，包含三部分内容：1. 给出被试具体语境，调查被试认为应该使用哪个被动标记——这一部分考察的变异项在于，各被动标记在不同口语语境中出现的频率/次数；2. 给被试展示不同的图片，引导被试就图片内容说话——考察在自然语流中被试更倾向于使用哪种被动标记；3. 给被试分别展示三段文字，看过后分别让其对语段内容进行复述——与 2 相同，这里依然意在考察被试主动无意识的输出情况，各个被动标记词出现的频率又有多高，涉及到的变异项为被试倾向于使用哪种变异项。谈话过程录音，并同时在问卷上作以记录。

（三）分析结果

遗憾的是，由于前期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对实际调查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没有做到周密的考量，同时问卷本身对于所调查的变异项和变异指标认识不清，因此实际调查效果并不理想。在第一部分的考察中，原本应当罗列四种主要的被动标记“被、让、叫、给”，然后给出被试语境，询问被试哪些被动标记词填在这里是合法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原本的选择题变成了判断题，也即让被试根据语感判断每句完整的含被动标记的被动句所使用的被动标记是否合法，这样就使得实验原始数据极大地束缚了最后的分析结果，因为如果原句子使用的被动标记词是“让”，而原句本身又是既符合语法又符合语义的，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所有被试均认为该句合法，但换一个被动标记词“被”、“叫”可能依然合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问卷中所使用的被动标记词及其频率就基本上等同于实验结果统计到的数据，更致命的是各被试的统计结果显示，每位被试对被动标记词使用情况的判断并无显著差异。

采取如上的调查方法拿到这样的数据并不意外。但问题在于这样的数据本身并不适用任何一种理论上的检验方法来做定量的分析（因为并不是随机性的，而是深受问卷本身提示词影响的），只能通过定性的观察和比较来得出基本的结论，统计结果如下（由于后期资料拍摄不清晰，原统计记录问卷又已亡佚，因此下面的统计中剔除了 10 个人的数据，只保留 15

人的数据进行分析)：

序号	被	给	叫	让	被给	给给	叫给	让给	合
1	14	5	7	11	3	1	1	3	
2	11	6	6	7	3	0	2	2	
3	6	5	7	4	3	0	2	2	
5	13	5	7	8	4	1	2	2	
6	8	8	7	6	3	3	2	2	
7	6	3	9	8	3	1	2	2	
8	13	5	8	6	4	3	3	2	
9	11	4	6	5	3	2	2	2	
10	11	3	5	6	3	1	2	2	
16	9	5	7	5	3	2	2	3	
17	9	6	6	6	3	2	2	2	
18	7	5	7	6	2	3	2	2	
19	11	5	7	7	5	3	2	2	
21	11	8	7	6	3	1	1	2	
22	18	1	4	5	4	1	2	2	
合计	158	74	100	96	49	24	29	32	5
出现频率	0.281139	0.131673	0.177936	0.170819	0.087189	0.042705	0.051601	0.05694	

综合来看，被动标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依然是“被”，约为0.3（含“被”与“被.....给.....”），远高于其他三个被动标记词，其次是“叫”和“让”，但这样的统计分析其实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之所以“被”字出现的频率较其他两者更高，是因为问卷本身呈现出来的被动标记词中“被”字所占比重就比其他三个高。接下来我们又尝试着通过计算每位被试对问卷本身所使用的被动标记词的修正来考察各个被动标记词的分布状况（计算被试认为某被动标记词使用的不合法时被试对该词的修正，考察他们是使用哪种被动标记词的，并将替代的被动标记词进行统计），如下（“被/让/叫/给.....给”为0是因为直接将数据合并入了与之对应的单纯被动词中）（与上组数据相比，本组数据在统计时又剔除了没有出现替换更改现象的第1、3、22号发音人的数据，故只剩下12组数据）：

序号	被	给	叫	让	合计
2	5	2	0	2	9
5	8	1	0	2	11
6	1	2	0	0	3
7	0	0	1	3	4
8	7	0	1	0	8
9	5	0	0	0	5
10	4	0	0	1	5
16	3	0	0	0	3
17	2	1	0	1	4
18	1	0	0	1	2
19	7	0	0	1	8
21	5	1	0	0	6
合计	48	7	2	11	68

出现频率 0.705882 0.102941 0.029412 0.161765

虽然这种分析方法依然不符合卡方检验的统计模型，但我们在进行数据分析时还是选择了卡方检验的工具对以上数据从性别、学历、年龄、家庭语言环境、父母青少年时期的语言环境、工作语言环境、社区交往密度以及职业进行了计算分析，结果显示 P 值依然均高于 0.1，均不存在差异。但这依然属于调查方法获取数据的问题，使用这种调查方法本身就无法使用置信度工具对它进行统计学意义的检验。

性别	被	给	叫	让	合计	
男	24	1	1	7	33	$p=0.2032$
女	24	6	1	4	35	
合计	48	7	2	11	68	
学历						
本科	14	0	1	1	16	$p=0.1141$
大专	20	3	1	8	32	
中专	8	1	0	2	11	
高中	5	1	0	0	6	
初中	1	2	0	0	3	
合计	48	7	2	11	68	
年龄						
20 30	8	0	0	0	8	$p=0.3974$
31 60	21	3	1	3	28	
60	19	4	1	8	32	
合计	48	7	2	11	68	
父母青少年时期的语言环境						
北京话	25	4	2	6	37	$p=0.57$
非北京话	23	3	0	5	31	
合计	48	7	2	11	68	
工作语言环境						
北京话	47	5	2	11	65	
非北京话	1	2	0	0	3	
合计	48	7	2	11	68	
社区交往密度						
1 5	28	2	1	6	37	$p=0.4542$
6 10	15	5	1	3	24	
10	5	0	0	2	7	

48	7	2	11	68
----	---	---	----	----

职业(无 3,4)

劳动	19	1	1	1	22
技术	29	6	1	10	46
	48	7	2	11	68

$p=0.158$
1

家庭语言环境

单纯北京话	47	5	1	8	61
非北京话	1	2	1	3	7
	48	7	2	11	68

定性来看,在性别这一因素的考察中,男性和女性都更倾向于使用“被”这一被动标记词,但在其他标记词的使用上,男性更倾向于选择“让”,女性更倾向于选择“给”;学历高,越倾向于使用“被”,中专使用“被”的频率也相当高,正如儿化的统计一样,这种现象再一次佐证了拉波夫所提出的“曲线原则”,中等学历的人为了追求更具声望的语言意义形式,其言语表达会尽可能的贴近具有高学历的人的表达方式或风格特点,甚至会矫枉过正。含被动标记被动句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被”字,这种变化同样也是正在发生的变化。从年龄上看,年龄越小,使用“被”字来替换其他的被动标记词的频率越高,甚至达到了100%,这一真实时间也在历时上预示着单纯“被”字被动句将越来越占据主流地位的趋势。语言环境因素越被试的社区交往密度从数据统计上看与被动句的变异并无明显的相关关系。而被试的职业方面,由于我们将“社工”归为劳动密集型,导致出现劳动密集型的人群要比技术密集型的人群更频繁地使用“被”字被动句的情况。

以上是对第一个变异项统计结果的分析。第二个变异项的考察依然不理想。可能由于向被试呈现出的复述语料当中所含的全部都是“被”字被动句,因此导致被试在复述时,“被”字高频的出现,我们统计了所有发音人的复述材料,结果发现,只有两位发音人在复述时使用过一次“给”来作被动标记,只有一位发音人使用过一次“让”来作被动标记,其他全部都使用了“被”字被动句。

综上,由于调查前的准备工作和整体调查思路在前期出现问题,导致后期分析工作也举步维艰。这也为我们以后的社会语言学调查敲响了警钟。

参考文献:

- [1]林焘、沈炯 1995 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总第246期)
- [2]方强、李爱军 普通话鼻化元音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音实验室
- [3]张成才 2018年11月 西宁方言元音的高化、齿化和鼻化,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6期
- [4]王改改 北京话口语中的“被”字句,汉语学习 2003年02期
- [5]刘利红 被动标记“被”、“叫”、“让”、“给”语法化程度的差异,安徽文学 2012年09期
- [6]徐虹 现代汉语被动句标式、被动标记研究综述,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年07期
- [7]王聪、张明辉 现代汉语被动句研究综述,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